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主編/郝春文

2006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通訊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上海師範大學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所

主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2006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幹事名單：

中國 樊錦詩 郝春文 柴劍虹 鄭阿財(臺灣)

日本 池田溫 高田時雄

法國 戴 仁

英國 吳芳思

俄羅斯 波波娃

美國 梅維恒

德國 茨 木

哈薩克斯坦 克拉拉·哈非佐娃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網頁：

<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ILCDS/proceedings.html>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秘書處地址：

日本國 京都市 左京區北白川東小倉町 47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高田時雄教授 Tel: 075-753-6993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KYOTO 606-8265, JAPAN

2006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目 錄

學術綜述

- 2000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王義康(1)
2005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陳麗萍(26)
中國佛教偽經研究概述 楊 梅(60)
近年來國內佛教寺院經濟研究綜述 曾義青(71)

會議介紹

- Conferences and Publications Related to Dunhuang in North America,
2005 - 06 Stephen F. Teiser(77)
“絲綢之路的醫藥：傳播與轉化”研討會簡述 陳 明(81)
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成立暨第二屆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言
..... 程喜霖(86)

紀念文

- 啓功先生的“隨身寶”——寫在《敦煌寫經殘片彙貼》出版之際
..... 柴劍虹(92)
紀念孟列夫 府憲展(95)

出版信息

- 『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高昌殘影釋録』と『中村不折舊藏
禹域墨書集成』の刊行 高田時雄(100)
《神道人心——唐宋之際敦煌民生宗教社會史研究》出版 朱立峰(105)
書訊五則 王義芝(106)
《俄藏敦煌藝術品》編輯後記 府憲展(109)
《英藏黑水城文獻》出版前後 束錫紅(114)

論著目錄

2000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曾曉紅 陳麗萍(121)
2005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陳麗萍(146)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稿約	(186)

2000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王義康(中國國家博物館)

2000年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爲了使敦煌學在21世紀的發展邁上新的臺階,廣大學人追述敦煌文書發現、流散的歷史,紀念或評價、介紹國內外著名敦煌學家及他們的研究成果,回顧敦煌學術走過的歷程,展望、探索敦煌學未來的發展方向,成爲本年度敦煌學研究的顯著特點。

2000年敦煌學研究概況,馮培紅等已有介紹(《敦煌學輯刊》2001年2期),據初步統計,年度內發表論文約470篇,出版專著和論文集多達80餘部。本文根據《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所刊概述的體例,參考馮培紅等人文章,以及各種期刊、出版信息撰寫而成。以下對大陸地區年度研究成果,分類概括敘述。

概 說

本年度敦煌學概括性論著主要有學術回顧與瞻望、相關人事介紹與評價、文獻流散與收藏、文獻整理與研究、寫本辨偽、文獻資料編目與信息管理等方面內容。

敦煌學的發展已經歷了百年的歷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各有其時代特徵與學術成就,在新世紀之初,回顧過去,展望敦煌學未來的發展是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榮新江《中國敦煌學:回顧、現狀、展望》(《中華讀書報》2000年7月19日)回顧了敦煌學發展的百年歷史,並對中國敦煌學的現狀和未來發展進行了分析與展望。樊錦詩《回眸百年敦煌 再創千年新輝煌》(《群言》2000年7期、《新華文摘》2000年10期)也對中國敦煌學的百年發展史作了回顧與總結,並對敦煌學在新的千年裏應該做的研究與保護工作進行了展望。馮培紅《百年敦煌》(《群言》2000年8期),何寶民、楊富學《百年敦煌》(《尋根》2000年4期)兩文對過去一百年敦煌文書與石窟藝術研究的發展狀況進行了敘述,總結了各個階段研究的時代特徵與學術成就。榮新江《敦煌學:21世紀還是“學術新潮流”嗎》(《辭海新知》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高啓安《敦煌學——21世紀濤聲依舊》(《東方》2000年3期)兩文討論了21世紀敦煌學發展的趨勢,肯定了在新世紀敦煌學仍然是學術新潮流。沈衛星《敦煌學研究呈現五大趨勢》(《光明日報》2000年6月30日)、柴劍虹《談談敦煌學》(《北京日報》2000年8月14日)均對敦煌學的總體發展作了論述,

並指出了今後敦煌學發展的五大趨勢。余欣《人文視野中的敦煌學》(《敦煌學輯刊》2000年1期)對“敦煌學”的研究對象、性質等問題作了審視。

在回顧與展望的同時,學者還探討了未來敦煌學研究的方法。《光明日報》2000年9月5日開闢敦煌學專版,相關論文發表了這方面的見解。其中鄭炳林《培養复合型敦煌學研究人才》認為今後敦煌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專題研究的繼續和多角度利用敦煌學資料的綜合研究,二是敦煌文獻與敦煌石窟藝術的結合研究。提出敦煌學人才應注重對复合型人才的培養,才能擔當得起今後敦煌學研究的重任。樊錦詩《關於石窟研究的幾點思考》指出應加強石窟考古第一手資料的系統收集,對敦煌石窟藝術的全面綜合研究,更新研究方法與研究手段。王冀青《開拓敦煌學研究的新領域——以敦煌學史檔案的整理與研究為例》強調了對20世紀初年世界各國的考古探險家們的考古檔案進行研究的重要性與價值,指出隨著世界各國對敦煌考古檔案的不斷公佈,敦煌學史檔案的整理研究可以作為敦煌學研究的一個新的學術領域,而這些研究同時還可以促進敦煌學其它領域內的學術發展。

敦煌學的發展是經過了幾代學人的努力,紀念或評價、介紹國內外著名敦煌學家及他們的研究成果,也是敦煌學術回顧史的內容之一。榮新江整理了陳寅恪的《〈敦煌零拾〉劄記》(《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並在“後記”中對陳寅恪的治學途徑進行了討論,認為1927至1931年陳寅恪研究的主要問題是中印關係和西北史地,所用材料主要是敦煌發現的內典和俗文學作品,以及梵文、巴利文、藏文文獻和蒙元史料,今天理解陳寅恪不應僅僅局限於“三稿”、“別傳”。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應當把陳寅恪放在“國學大師”的圈子裏,而應當全面繼承他留給我們的豐厚文化遺產。關於“敦煌學”的最先發明權,王冀青對此做出新的判斷。他在《論“敦煌學”一詞的詞源》(《敦煌學輯刊》2000年2期)一文認為,“敦煌學”一詞應該是日本人首創的。日本敦煌學家石濱純太郎於1925年對國際敦煌學的起源、發展、研究範圍、問題,廣義敦煌學和狹義敦煌學的區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統的闡述。由此強調陳寅恪雖然不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敦煌學”一詞的人,但應該是在中國第一個使用“敦煌學”一詞的人。鄭阿財《潘重規先生敦煌學研究成果與貢獻》(《敦煌研究》2000年2期)介紹了著名敦煌學家潘重規先生在經學、文學、佛典、語言、文字等方面研究的成果與貢獻,並編輯了潘重規先生敦煌學論著目錄。馬德發表了《一代尊師 學界楷模——史葦湘先生的獻身精神與學術成就》(《敦煌研究》2000年3期)、《史葦湘先生與敦煌學》(《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兩篇文章,詳細說明了史葦湘在壁畫臨摹、資料調查與敦煌學研究理論等三

方面的貢獻,作者認為史葦湘無論在哪一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體系與方法,高度評價了他的敦煌學研究成就。楊富學《孫修身先生與敦煌學》(《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一文對孫修身在敦煌佛教東傳史跡壁畫、中國與南亞歷史文化關係、莫高窟經變畫、《佛說報父母恩重經》版本、瓜沙曹氏歸義軍政權、甘州回鶻等方面的研究作了評述,高度評價了他對敦煌學的重要貢獻。榮新江《敦煌學百年:海外漢學的奉獻》(《光明日報》2000年10月20日《歷史周刊》)對百年來國際漢學研究中的敦煌學成果進行了介紹,肯定了海外敦煌學研究的貢獻。張廣達《悼克里姆凱特教授》(《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介紹了德國波恩大學比較宗教學研究所主任教授克里姆凱特的生平和他的主要研究成就,認為克里姆凱特教授所作的工作,方便了有志於從事伊朗語、突厥文書的後學者進一步直接研讀或利用,他修橋鋪路,功不可滅。蔣維崧《丘古耶夫斯基與敦煌學》(《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高度評價了俄國敦煌學家丘古耶夫斯基在敦煌學研究方面做出的巨大貢獻。陳民《松本榮一先生與敦煌學研究》(《敦煌研究》2000年3期)對20世紀上半葉日本的一位敦煌學專家進行了介紹,列舉了他的論文目錄。王冀青《拉普生與斯坦因所獲佉盧文文書》(《敦煌學輯刊》2000年1期)利用英國圖書館和牛津大學發現的檔案資料,對英國敦煌學者拉普生及布婁整理考釋斯坦因所獲的佉盧文文書的學術活動進行了介紹,肯定了他們的功績。榮新江《北京大學早期敦煌學研究》(《文化的饋贈——[1998]漢學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史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介紹了1949年前北京大學開展敦煌學研究的歷史。

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之際,敦煌文獻發現、流散與敦煌文物保護、破壞的過程,以及有關的人與事,也是本年度研究的熱點。榮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敦煌研究》2000年2期)對王道士在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和文物流傳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作了評說。李劍虹《論敦煌失寶及葉昌熾〈緣都廬日記鈔〉》(《敦煌研究》2000年2期)通過對葉昌熾日記的考察,認為葉氏在外國探險者到來之前有幸接觸敦煌文書,可惜他未予考察,失之交臂,對敦煌學未能做出應有的貢獻。劉詩平、孟憲實著《敦煌百年——一個民族的心靈歷程》(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版)回顧了一個世紀以來敦煌文物流散的歷史,以及幾代學人嘔心瀝血,追尋國寶,努力研究,最終使“敦煌學”回歸故里的歷程。劉進寶著《藏經洞之迷——敦煌文物流散記》(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以敦煌遺書的發現和流失為綫索,對藏經洞封閉之謎的各種說法作了介紹,敘述了近代英、法、日、俄、美等國探險家對敦煌文物的盜劫,造成敦煌文物在世界各地的流散。他的《華爾納及其敦煌考察團述論》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年1期)對美國探險家華爾納在敦煌莫高窟、黑城與甘肅涇川等地盜割壁畫、彩塑等文物的醜行進行了抨擊,同時對哈佛燕京學社的創立做了考證。馬德《敦煌文物流散的反思》(《檔案》2000年3期)討論了敦煌文物流散的問題,並對這一問題作了反思,提出了建設性意見。謝生保、趙崇民《第一個得到藏經洞文書的外國人》(《敦煌研究》2001年1期)認為第一個得到文書的人是曾經給德國地理學家霍芬當過助手,並在中國做官的比利時人——保爾·施普靈蓋爾特。[俄]孟列夫著、廖霞編譯《被漠視的敦煌劫寶人——塞繆爾·馬蒂洛維奇·杜丁》(《敦煌學輯刊》2000年2期),對上個世紀之初的一位俄國“探險家”與敦煌有關材料進行了介紹。賀世哲《對張大千“不曾破壞敦煌壁畫”之質疑》(《敦煌研究》2001年1期)一文對這一“歷史懸案”進行了重新討論。

敦煌文獻整理研究方面,一些學者不僅對過去進行了總結,而且對未來的發展從理論方面進行了探討。榮新江《敦煌文獻整理校錄瑣議》(《光明日報》2000年9月5日)強調了整理校錄敦煌文獻的重要性,要使之成為像標點本《二十四史》那樣的權威本,以供學術界研究。張涌泉《提高敦煌文獻整理研究水平的當務之急》(《光明日報》2000年9月5日)從敦煌文獻自身的特性出發,指出研究閱讀敦煌文獻有三大障礙,俗字、俗詞、佛教文獻等造成了研究者的困難,敦煌學界當務之急是在已有研究基礎之上,編出一本規模更大、收詞更廣的《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作為敦煌文獻研究的工具書,來提高敦煌學研究的水平。郝春文《英倫研讀敦煌文書原件劄記——研讀原件對全面整理、研究敦煌文獻的意義》(《敦煌研究》2000年2期)通過他在英國圖書館的體會,指出研讀原件對於準確全面地釋讀敦煌文書和認識文書與卷子的重要作用。榮新江《敦煌文獻:新材料與新問題》(《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1輯)對21世紀敦煌文獻研究進行展望,提出了重新發掘敦煌文獻的史料價值,推動敦煌學新進展。鄧文寬《敦煌文獻研究的世紀回眸》(《中國考古學跨世紀的回顧與展望》,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分宗教、歷史、地理、文學、語言文字、科技、中西文化交流、儒家經典等多個方面,介紹了敦煌文獻對於學術研究的價值,回顧了20世紀海內外學者敦煌文獻研究的歷程,並對21世紀敦煌學研究提出三點具體建議。湯建平等在《中州學刊》2000年1期發表5篇關於出土文獻與文獻研究的筆談文章,其中談及敦煌出土文獻與唐代文獻研究的關係。

本年度具體的敦煌文獻整理與研究,相繼有綜合性論著問世。宋家鈺《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文獻研究——紀年敦煌文獻發現一百周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既收有對敦煌漢藏文書的考釋,也有多位學者研

究敦煌文獻的論文。榮新江《甘藏敦煌文獻知多少?》(《檔案》2000年3期)介紹了甘肅收藏的敦煌文獻的數量及內容。榮新江《〈英藏敦煌文獻〉定名商補》(《文史》2000年3輯)對四川人民出版社版《英藏敦煌文獻》一書中有些文書的定名進行了重新考證,共涉及14個卷目的94篇文書。王倚平、唐剛卯《湖北省博物館藏敦煌經卷概述》(《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介紹了湖北省博物館所藏的31件敦煌文書。

關於敦煌寫本的真偽,邵惠莉《甘肅藏非敦煌文獻的真偽、來源及相關問題》(《敦煌學輯刊》2000年2期)對《甘肅藏敦煌文獻》(六冊)附錄的非敦煌文獻、未收入書中的贗品及誤為敦煌寫經的後人抄寫的唐碑文進行了介紹。韓惠言《甘藏敦煌漢文獻概況》(《敦煌學輯刊》2000年2期)對11家、689件甘藏漢文獻的來源及真偽、時代及書法特色、內容及價值等進行了論述,認為甘藏敦煌漢文獻有如下特點:收藏單位多,但來源清楚,文獻可靠;數量可觀,是國家圖書館之外第二大收藏地;時間跨度大,北朝寫本多,書法鑒賞和研究價值高;非佛教文獻雖然數量有限,但名品、精品不少。

在敦煌文獻資料編目方面,施萍婷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中華書局2000年7月版)在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基礎上作了精心的校勘與增補,使某些文書的定名更為準確。方廣錫《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斯6981號—斯8400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對英藏斯坦因所獲文書6981號之後的文獻編製了目錄。白化文《敦煌學原材料與研究書刊的圖書館編目問題》(《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3期)、《中國學術界對敦煌文獻所作的圖書編目與整理工作——中國敦煌學目錄和目錄工作的創立和發展》(《文化的饋贈——[1998]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考古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從敦煌文獻與圖書編目的關係出發,探討了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楊寶玉《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目錄述要》對50年代後出版的英藏敦煌漢文目錄以及新編成的《英藏漢文佛經以外敦煌文獻總目索引》作了評述。柴劍虹《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叙錄〉》(《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對該書中譯本出版的過程作了說明,同時還對《俄藏敦煌漢文寫卷叙錄》原書及中譯本內容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看法。敦煌研究院編著《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獻研究篇》(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收錄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獻的研究論文30餘篇,書後附有《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獻論文目錄》為其每篇文書的研究信息。

宗 教

本年度的敦煌宗教研究涉及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

佛教方面,發表的論著主要有文獻資料的刊佈、文書整理與研究(包括譯經)、佛教傳播及佛教文化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佛教研究回顧與瞻望等等。林世田、申國美編《敦煌密教文獻集成》(3冊,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收集了敦煌文獻中的密宗文獻。牛汝極出版了《回鶻佛教文獻——佛典總論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鶻佛教文獻》(新疆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佛教文獻研究方面,王紅梅《回鶻文藏傳密宗〈轉輪王曼陀羅〉第二十至三十頁譯釋》對藏文密宗經典的核心部分進行了譯釋。邵惠莉《敦煌寫本〈佛圖澄所化經〉初探》(《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對青山慶示捐獻給敦煌研究院的一件《佛圖澄所化經》文書進行了校釋,考證它產生於463年左右,並對它性質、用途、影響和反映的民間信仰作了說明。張總《〈閻羅王授記經〉綴補研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對《閻羅王授記(十王)經》插圖、寫本均做了綴合,從而對完整的插圖本兩種類型作出了分析區別;文中還從俄藏殘片中識別出一個別本,剔除一個錯訛為此經的《灌頂經》;還舉引了漢文傳世本、回鶻經本情況,並注意到西夏文本的重要線索。考定推年方面,也從疑偽經典組合、董文員的三幅繪卷與八十餘歲老人所抄數經方面分別有所深入探討。又從十王中主要的三王組合方面發現了演進的脈絡。牛汝極《敦煌吐魯番回鶻漢譯疑偽佛典》(《敦煌學輯刊》2000年2期)專門論述了敦煌吐魯番發現的9件回鶻漢譯疑偽佛典:《阿彌陀經》、《慈悲道場懺法》、《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佛頂心大陀羅尼》、《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佛說溫室洗浴衆僧經》、《梁朝傅大夫金剛經併序》和《十王生七經》。該文首先對每一件文獻作簡要說明,然後介紹收藏單位的編號、整理者及其研究成果,最後提供了相關研究參考文獻。徐文明《智詵與淨衆禪系》(《敦煌學輯刊》2000年1期)對杜斗城《〈歷代法寶記〉與蜀地禪宗》一文的觀點進行重新評論。

另外,若干論文對佛教文獻研究進行了綜述與評價。張子開《敦煌寫本〈歷代法寶記〉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年2期)介紹了國外學者對該文獻的研究狀況,與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李德龍《論日本學者對敦煌古藏文禪宗文獻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0年6期)介紹了日本學者在古藏文禪宗文獻研究上的貢獻。白化文《方廣鋁〈敦煌佛教經錄輯校〉》(《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對方廣鋁佛教文獻研究給予很高評價。邵瑞祺《來自乾陀羅的古代佛教經卷——英國圖書館所藏法盧文殘片》(R. 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i Fragments*)出版後,王邦維發表評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首先介紹了這批法盧文殘片佛經的發現、入藏英國圖書館的經過,然後對邵瑞祺書的

內容逐章進行了介紹，同時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三點看法，為邵瑞祺教授以及相關研究做了補充。楊富學《敦煌文獻對中國佛教史研究的貢獻》（《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2期）介紹了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佛教文獻，並與正統佛典進行對比，進一步闡述了敦煌佛教文獻的發現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巨大貢獻。

關於佛教文化交流、佛教文化對世俗社會的影響、佛教寺院方面的研究，楊富學、王書慶合著《唐代長安與敦煌佛教之關係》、榮新江《法門寺與敦煌》（均載《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考察了晚唐京城長安與西陲敦煌兩地間的佛教文化往來交流的實際情況。高啓安《崇高與卑賤——敦煌的佛教信仰賤名再探》（《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通過“佛奴”、“佛婢”、“昆侖”、“糞堆”等古代敦煌人的姓名考察，認為起賤醜名與敦煌佛教信仰有着密切關係。嚴耀中《敦煌文書中的“平等”和唐宋間的均平思想》（《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根據敦煌文書出現的與諸神併列的平等大王，認為平等大王即閻羅王，該名的出現是唐宋之際佛教平等思想在民衆中的反映，並進一步與農民起義聯繫起來。袁德領《歸義軍時期莫高窟與敦煌寺院的關係》（《敦煌研究》2000年3期）對歸義軍時期莫高窟寺院的職能、規模、常住僧的來源及寺院的收入等問題做了探討。

在道教文獻整理研究方面，王卡《敦煌殘抄本〈太上濟衆經〉考釋》（《唐研究》第6卷）首先釋錄了P. 2364、P. 2792兩件法藏敦煌本《太上濟衆經》的內容，又對S. 810、北圖22v + S. 7986等文書進行定名與綴合。該氏《敦煌S. 6310號殘卷抄本綴合定名之誤》（《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考定由兩枚碎片拼合而成的敦煌S. 6310號抄本，前半片是《靈寶昇玄經》卷八殘抄本，後半片是《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二十三之殘抄本。應該在新的敦煌目錄中糾正過去著錄的錯誤，將S. 6310著錄為兩個分號，即S. 6310A《靈寶昇玄經》卷八；S. 6310B《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二十三。張澤洪《論唐代道教的寫經》（《敦煌研究》2000年3期）以敦煌道經寫本題記為中心，探討了唐代《道藏》編撰及道經的傳寫，並提出一些新的見解。萬毅《敦煌本道教〈昇玄內教經〉的文本順序》（《敦煌研究》2000年4期）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結合古代典籍中散見的佚文，對道教佚經《昇玄內教經》的敦煌寫卷的卷次問題進行了探討，並對兩件敦煌寫卷的文本進行了拼合，對文本順序進行了排列。

景教文獻與景教史的研究方面，吳其昱《唐代景教之法王與尊經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對P. 3847號文書所錄22個法王名和35部尊經經目做了翔實的考訂，認為以上景教法王和尊經漢譯書目，曾在全國教會內流行，其重要意義在於希臘文化，尤其科學哲學思想之傳播及影響。林悟殊《富岡謙藏氏藏景教〈一神論〉存疑真偽》（《唐研究》第6卷）對該景教文書的披露

和刊佈、研究概況和錄文進行了回顧，同時還就富岡文書真偽談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文書在最終未被證明是偽抄之前，還有其特定的資料價值，但使用該文書則需謹慎小心。他的《敦煌景教寫本 P. 3847 之再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首先對 P. 3847 文書重新著錄標點；其次，討論了 P. 3847 卷子三部分的關係，認為《讚》和《尊經》雖同屬一寫卷，但不僅內容和表達形式有別，而且各有本源，前者譯自敘利亞文，後者是直接用漢語撰成，而從卷子原件考察，兩者均是獨立寫本，為了製成卷子才粘接起來，本非同一經文。再次，對《按語》的寫作動機做了考察，認為從《按語》的行文考慮，更大的一種可能性是出於整理本教經典，保存血脈，留存後世的目的。進一步推論直至公元十或十一世紀，中國仍有虔誠的景教徒為了本教的生存延續，還在整理傳抄本教的經文。段晴《敦煌新出土敘利亞文書釋讀報告（續篇）》（《敦煌研究》2000 年 4 期）通過對文書的釋讀，認為，B53: 14 號敘利亞文書是《詩篇》的 Shurayi 類節選，供景教徒於平時每日黃昏禱告時唱詩之用；《詩篇》節選的斷句依據是唱詩時輪流應答的形式，每一件末尾的句號實際上應該是休止符號；文書證明在元代的敦煌，景教曾經有過實際活動。趙崇民、楊富學翻譯了德國學者克雷恩、土巴奇《敦煌出土敘利亞文基督教文獻殘卷》（《甘肅民族研究》2000 年 4 期）。該景教文獻藏敦煌研究院，經過轉寫和翻譯之後，對之進行了考釋，斷定是一份元代景教文獻，原屬保羅頌經詩的一份彌撒書，為其贊美詩開頭部分，該文書對於瞭解景教東傳和禮拜儀式具有較高的價值。

關於摩尼教，林悟殊《柳洪亮主編〈吐魯番新出摩尼教文獻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對該書錄入的粟特文書的翻譯、文書的性質與史料價值，及該書的專題論文進行了評述。祆教研究方面，林悟殊《20 世紀中國瑣羅亞斯德教研究述評》（《歐亞學刊》2000 年 2 輯）第七部分介紹了陳垣、施萍婷、姜伯勤，及日本學者池田溫、小川陽等人的論文及其對祆教研究的貢獻。

歷史與地理

本年度利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唐五代歷史與地理的論著，內容涉及歷史史實考辨、政治、法律、軍事、歸義軍史、經濟史、歷史地理諸多方面。

歷史史實考辨。張銘心《“義和政變”與“重光復辟”問題的再考察——以高昌墓磚為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在前人高昌史研究的基礎上，對“重光復辟”做了進一步的探討，認為“重光復辟”的最後勝利的時間非重光元年二、三月，而是此年正月；義和六年（延和十八年即公元 619）九月，復辟政權已佔領了田地城，“重光復辟”進入了“局部勝利”的階段；“重光復辟”時義和政權出現了分裂現象；《高昌夏田殘券》中“延和”年號的出現與義和政

權內部分裂有關；“重光復辟”分爲三期，第一期爲義和政權分裂期，時間爲義和六年(619)前後，第二期爲軍事復辟期，“重光復辟”從“局部勝利”發展到“全面勝利”，時間爲義和六年九月或九月前，到延和十九年(重光元年)正月。第三期爲王國再建期，時間爲重光元年二月；“義和政變”爲王子爭權而引起的宮廷政變。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記〉與“玄武門之變”》(《敦煌學輯刊》2000年2期)首先對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提出新解，認爲在“玄武門之變”中，武則天一家站在太子、齊王一邊，爲太子、齊王鳴冤的《唐太宗入冥記》產生於武則天以周代唐之時。其次考論唐太宗在“玄武門之變”前後的一系列政治行爲，清洗掉史書的粉飾，恢復歷史本來面貌。趙望秦《敦煌遺書 P. 2044v〈文範〉中的“太保相公”究竟指誰》(《敦煌研究》2000年3期)對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一書中“太保相公”指僕固懷恩的說法提出質疑，認爲應指李光弼。李麗《敦煌本〈往五臺山行記〉中的“王侍中”及其有關問題考》(《敦煌學輯刊》2000年1期)考證“王侍中”是五代時期的王建立，文書的成抄時間在後唐天成五年(930)至後晉天福十二年(947)之間。謝生保《敦煌李氏三碑綜述》(《敦煌研究》2000年2期)對敦煌莫高窟所發現的關於李氏家族的三塊碑文進行了介紹，認爲這三塊碑對於研究敦煌的歷史起着極爲重要的作用。

政治、軍事制度。李方《唐代考課制度拾遺——敦煌吐魯番考課文書考釋》(《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利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21件考課文書，分官吏自書考狀、官府有關考課的公文、官府考課記錄、考使入京有關記載等四類，探討了唐代地方官吏的考課制度。孟憲實《麴氏高昌追贈制度初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鑒於史書記載對高昌官僚制度水平估計過低，探討了高昌的追贈制度，認爲作爲一種政治制度，高昌的追贈已經納入了官僚升遷銓選序列之中。高昌的追贈制度發揮着維護現存社會等級的功能。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中華書局2000年版)是迄今爲止第一部全面系統研究過所制度的專著。李方發表評論(《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認爲該書對過所資料收集詳備，論證嚴密，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1月版)利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有關軍事文書考察了唐代府兵、兵募、健兒、行軍、軍鎮等項軍事制度。該氏《〈武周兵健、戍官行使等功狀殘文書〉補釋》(《敦煌學輯刊》2000年2期)針對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一書收錄的《武周兵健、戍官行使等功狀殘文書》圖版和錄文的錯釋、漏釋之處進行了補釋，並指出文書對研究唐代健兒制度的資料價值。

法律制度。張艷雲《〈文明判集殘卷〉探究》(《敦煌研究》2000年4期)從

法制文書殘卷入手，探討了唐初的法律制度。陳永勝《敦煌買賣契約法律制度探析》（《敦煌研究》2000年4期）通過對敦煌買賣契約的分析，認為敦煌買賣契約構成我國古代民商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契約要素條款齊全，合意制度、擔保制度、時效制度等現代契約制度都得到了較充分的體現，而且已萌生出“官有政法，人從私契”，公法與私法之法律基本分類。齊陳駿《古絲綢之路法律文化資料述論（上、下）》（《文明的脚步——絲綢之路繁榮與法律文化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上篇運用傳世文獻分階段考察了古絲綢之路各代政權特別是少數民族政權在這裏實行的法律制度；下篇運用敦煌吐魯番文書考察法律條文、官文書、訴訟文書和判集等。同著載錄有馮培紅《從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籍賬、契約等文書看3—11世紀絲綢之路地區的法制氛圍》一文。該文以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各類官私籍賬、契約等文書為基礎，結合中原王朝或地方政權對敦煌、吐魯番地區實行的積極有效的管理，探討了3—11世紀絲綢之路地區的法制氛圍。

本年度經濟史研究論著有回顧與評價、綜合性著作，及經濟史專題研究論著。楊富學《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百年回顧》（《敦煌研究》2000年4期）對國內外學術界關於敦煌、吐魯番、哈密、庫車、莎車等地出土的數百件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的研究概況作了回顧與總結，內容涉及9—14世紀回鶻人文化生活、土地制度、賦役制度、高利貸、階級關係、民族關係、社會習俗與宗教等多方面。陳國燦《唐代的經濟社會》是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唐代經濟史的論著，王素對該書逐章進行評論（《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認為此書大體上是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為中心，結合傳世文獻進行研究的成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收錄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論文23篇，其中運用文書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研究中古經濟史的論文達11篇，涉及範圍較廣，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土地制度。王永興《敦煌文書與唐史研究》（《文物》2000年8期）以均田制、水利史研究為例，具體論證了敦煌文書對於唐史研究所具有的價值。陸離《俄、法所藏敦煌文獻中一件歸義軍時期土地糾紛案卷殘卷淺識——對dx.02264. dx. 08786. 與 P. 4974 號文書的綴合研究》（《敦煌學輯刊》2000年2期）對 dx. 02264. dx. 08786. 與 P. 4974 號文書進行了校錄，認為這三件文書實為歸義軍張奉承時期的同一件土地糾紛訴訟案卷的殘卷，並對該案件內容以及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趙雲旗《唐代敦煌吐魯番地區土地買賣研究》（《敦煌研究》2000年4期）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探討了唐代這兩地區土地買賣的發展及其範圍、土地買賣的形式、土地買賣的原因等問題。金聖翰《論唐代敦煌戶籍文書中的“自田”》（《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針對均田制之外還存

在合法土地的看法，利用傳世文獻與敦煌文書，圍繞均田制下農民土地所有的法律規定及土地四至、均田制以外是否存在土地兩個問題展開討論，認為均田農民在均田制以外沒有合法土地是不能斷定的。趙雲旗《唐代敦煌吐魯番地區土地買賣研究》（《敦煌研究》2000年4期）對敦煌吐魯番土地買賣的發展與範圍，及其敦煌吐魯番地區土地買賣的形式、原因等問題做了討論。劉紅運《敦煌文書所見的“莊”、“田莊”、“莊田”、“莊園”非封建莊園說》（《敦煌學輯刊》2000年2期）一文將唐五代宋初敦煌文獻中含有“莊”字的文書歸類進行分析，提出作者的看法，敦煌文書中大量出現的“莊”、“田莊”、“莊田”、“莊園”，多數即指田地、田宅，與一般的田產、田宅並無不同。其“莊”、“莊園”都不是基本的、獨立的生產和經營單位。否定了史學界所說的封建莊園。盧向前《唐代西州合戶之授田額——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五》（《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認為唐代西州老、寡及小等合戶，可額外多得常田一畝、部田二畝；此種標準存在的原因，一方面在於當地土地的欠少，另一方面則在於唐代官府為了體現標榜矜寡孤獨老疾有所養的儒家思想。朱雷《P. 3964 號文書〈乙未年趙僧子典兒契〉中所見的“地水”——唐沙、伊州文書中“地水”、“田水”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7輯，2000年，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對敦煌文書中出現的“地水”一詞進行釋義，認為地水亦作田水，但在P. 3964號文中的地水却是狹義上的含意，專指灌溉用水。

稅收制度。〔日〕堀敏一著，張宇譯《中唐以後敦煌地區的稅制》（《敦煌研究》2000年3期）對歸義軍時期敦煌的賦稅制度進行了探討，認為此時的賦稅主要是官布、地子和柴草，並指出地子係地稅的一部分，柴草、官布也是按地征納的。蘇金花《試論晚唐五代敦煌僧侶免賦特權的進一步喪失——兼論歸義軍政權的賦稅制度》（《敦煌研究》2000年3期）認為晚唐五代敦煌寺院僧侶雖向世俗政權繳納基於土地的各類賦稅，但仍然享有免除基於人身徭役的待遇。兩稅法以來僧侶免賦特權的進一步喪失，既是僧人私有經濟高度發展的結果，又是整個封建社會歷史的折射。

商業。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市場外來商品輯考》（《中華文史論叢》63輯）在梳理敦煌文書的基礎上，考察了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流通於敦煌貿易市場上的各種商品。劉玉峰《試論唐代的公驗、過所制度與商品流通的管理》（《敦煌研究》2000年3期）討論了唐代公驗、過所的管理特點與不足之處。

種植業與畜牧業。王艷明《從出土文書看中古時期吐魯番的葡萄種植業》（《敦煌學輯刊》2000年1期）根據吐魯番文書中相關材料，對該地區葡萄種植的規模、屬性，葡萄園地的還授、租佃、買賣關係，經營、稅役以及葡萄加工、銷售等問題作了探討。魏迎春《古代高昌地區畜牧業狀況管窺》（《敦煌學

輯刊》2000年1期)利用吐魯番文書,結合文獻資料對古代高昌地區畜牧業的發展規模、牲畜種類、牧養方式及官方相應的管理制度作了初步探討。

歸義軍史研究內容涉及到史實考證、職官制度、地方行政等諸多方面。方廣錫《宣宗關於歸義軍的詔敕》(《敦煌研究》2000年3期)對S.11345號文書進行了釋讀,認為它是敦煌光復後唐王朝為褒獎張議潮而以宣宗名義頒發的一件正式詔敕,是歸義軍歷史的重要見證,也是在敦煌遺書中發現的第二件詔敕,因而是珍貴的歷史文物。李麗《張議潮“束身歸闕”之原因考:敦煌張氏歸義軍內部矛盾之我見》(《社科縱橫》2000年3期)分析了張議潮與其侄張淮深之間的矛盾,討論了張議潮歸闕的內部原因。王艷明《瓜沙州大王印考》(《敦煌學輯刊》2000年2期)根據敦煌文書和其他史料考證出:曹宗壽時曾冒稱“瓜沙州大王”,並開始了“瓜沙州大王印”的使用,該印曾用於曹宗壽時期的一次官方佛經清理,旋因藏經洞的封閉而得以保存。李正宇《沙州歸義軍樂營及職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對歸義軍樂營的存在、延續、職事及樂營藝人的兼職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在另一文《歸義軍樂營的結構與配置》(《敦煌研究》2000年3期)又對歸義軍樂營的組成結構及配置情況做了探討。劉進寶《試釋敦煌文中的“指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7輯,2000年)區分了“指搨”一詞作動詞與名詞使用時的不同含義,認為“指搨”作名詞其義指官名指揮使,同時對“指搨戶”進行了探討。馮培紅《唐五代歸義軍節院與節院使考》(《敦煌學輯刊》2000年1期)對歸義軍節度使向中原王朝求賜旌節與藩鎮旌節制度作了初步研究,並對節院與節院使等機構官名進行了考證。馮培紅《歸義軍時期敦煌縣諸鄉置廢申論》(《敦煌研究》2000年3期)認為歸義軍建立伊始,即恢復敦煌等十鄉,取消懸泉、壽昌、從化三鄉,新建赤心鄉,形成十一鄉建制,持續到張承奉時代。曹氏歸義軍時期沿襲十一鄉建制規模。到十世紀三十年代,歸義軍勢力趨於鼎盛,建立通頰鄉。曹元忠時期又廢通頰、玉關二鄉,成十鄉建制,直至歸義軍政權覆滅。劉再聰《敦煌歸義軍政權學校教育研究》(甘肅省史學會編《史學論叢》9集,甘肅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考察了歸義軍時期的州、縣官學和佛教寺院開辦的寺學以及民間私學等教育內容,以為這種多渠道辦學的方式為歸義軍政權提供了人才。

關於歷史地理,研究內容涉及敦煌地理文獻的校理、介紹,地理沿革、交通、地志等方面,以及相關評論。郝樹聲《敦煌懸泉里簡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年3期)根據新近出土記載河西若干地區驛置道里的漢簡,對兩漢蒼松、鸞鳥、張掖、姑臧和顯美等縣的具體位置進行了堪定,提出了新的看法。榮新江《敦煌本〈貞元十道錄〉及其價值》(《中華文史論叢》63輯)對P.2522

《貞元十道錄》所存的劍南十二州進行了介紹，認為這一殘存僅16行的文書，不僅保存了《貞元十道錄》的本文，而且還保存了其書寫體例與形制，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材料。孫繼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書四六四八號的寫作年代及其研究歷史交通地理的資料價值》（《歷史地理》2000年14輯）考證P.4648號僧人行記文書的寫作年代為後唐時期，並介紹了該僧人往五臺山行記中涉及的道路交通問題的史料價值。榮新江《李正宇〈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從諸卷源流、錄文校勘和古典今事的考辨等三個方面對《箋證》作了評價。李并成《大漠中的歷史豐碑——敦煌境內的長城和古代遺址》（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一書介紹了古敦煌郡內漢長城遺址和古長城。孟憲實《王素〈高昌國史·交通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王素《巫新華〈吐魯番唐代交通路綫的考察與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分別對兩部關於西域交通史的論著發表了評論。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了楊秀清著《華戎交彙的都市——敦煌與絲綢之路》。

古 籍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關於敦煌保存下來的古代典籍與唐代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羅國威《天津藝術博物館敦煌本〈文選注〉箋證（下）》（《文史》2000年第1輯）對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和孔稚珪《北山移文》作了箋證考釋。饒宗頤《敦煌吐魯番本文選》（中華書局2000年版）、羅國威《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羅國威《敦煌本“文選注”箋證》（巴蜀書社2000年版）、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出版後，徐俊對其同時發表評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認為這幾種有關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的整理和研究，將會推動今後的古典文學研究。許建平《李方〈敦煌‘論語集解’校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認為該書有卷子收集齊全、底本選擇優良、對校本子衆多、校記翔實等優點，同時也對不足之處提出一些修改意見。

社 會 與 文 化

本年度利用敦煌文書研究社會與文化主要涉及喪葬禮儀、婚俗、習俗、飲食文化、體育教育等方面。

關於敦煌所出唐代喪葬、吉凶書儀、占卜文書研究，吳麗娛《敦煌所出杜佑喪服制度圖與鄭餘慶元和書儀》（《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首先肯定了敦煌P.2967《喪禮服制度》文書對《唐禮圖》在史料學和目錄學上的重要意義，其次指出該文書對研究中古時期喪服制度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並聯繫鄭餘慶《大唐新定吉凶書儀》進行了研究。趙和平《晚唐河北地區的一種吉凶